

# 学术史：课程与作业

UESHUSHI KECHENG YU ZUOYE

——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为例

陈平原 编著

学术史研究随想

“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

学术史上的“现代文学”

“当代学术”能否成“史”

“学术文”的研习与追慕

反思“文学史”


重建“中国现代文学”

安徽教育出版社

# 学术史：课程与作业

——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为例

陈平原 编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术史:课程与作业:“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为例 / 陈平原编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7. 7  
ISBN 978 - 7 - 5336 - 4627 - 1

I. 学… II. 陈… III. 现代文学—文学史—中国—高等学校—教学参考资料 IV. I209. 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18434号

责任编辑:王骏

装帧设计:何宇清

---

出版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回龙桥路1号

邮 编:230063

网 址:<http://www.ahep.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安徽省瑞隆印务有限公司

---

开 本:650 mm×960 mm 1/16

印 张:17.75

字 数:280 000

版 次:2007年8月第1版 200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2 000

定 价:26.80元

---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电 话:(0551)2823297 2846176

# 目 录

MULU

学术史课程的理念与实践(代序)/1

## 一辑 课堂讲录

学术史研究随想/9

“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13

学术史上的“现代文学”/16

“学术史丛书”总序/23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存”总序/25

“当代学术”能否成“史”/28

“学术文”的研习与追摹

——“现代中国学术”开场白/32

附录 “现代中国学术”课程阅读文选目录

反思“文学史”/48

附录一 “中国文学研究百年”课程安排

附录二 “中国文学研究百年”课程主要参考书目

重建“中国现代文学”

——在学科建制与民间视野之间/54

附录一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课程安排

附录二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课程主要参考书目

附录三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课程安排

## 二辑 课程作业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课程作业·小引/79

学科发展的参照系

——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述评(刘子凌)/81

批评理念与道德意趣

——谈夏志清的中国文学研究(祝宇红)/97

生命的“挣扎”与“救赎”

——钱理群学术研究述评(郭春梅)/116

出入文学史写作的内与外

——浅论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著述(刘黎琼)/132

坚持个性、执著探索

——赵园的学术发展脉络(汤莉)/148

读人与读己

——略论赵园治学思路及著述文体的选择(倪咏娟)/163

从“前缘”到“边缘”

——黄子平的批评踪迹(李春)/180

史学想像与诗学批评

——论王德威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林分份)/196

在思想与文学之间

——王晓明的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张春田)/217

理论与方法

——汪晖的文学史与思想史研究(季剑青)/237

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

——木山英雄著作出版座谈会/254

## 学术史课程的理念与实践(代序)



念研究生时,专业方向是“中国现代文学”;因博士论文关注古今小说的转折,谈“中国小说史”,对我来说,也还算本色当行。没想到,走上北大讲台才四年,学术兴趣就开始转移。从1991年秋季起,十五年来,我在北大中文系为研究生讲授的专题课,“文学史”与“学术史”的比例,几乎对半开。

九十年代初,斗转星移,个人的心境及趣味大为改变,原先以小说史为中心的学术设计,不得不做大的调整。有些偶然因素,加快了这一调整的步伐,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是《学人》集刊的创办,一是北大的选修课制度。后者要求像我这样自认为“授业”还算认真的教师,必须不断地给学生提供“新知识”。你要是几年不变,只念一本经,研究生无法重复选修。当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也可以同一锅汤,每年更换不同标签。只是那时年少气盛,决定另辟蹊径,多讲一两门自认为有意思的新课。

刚刚闯入一个陌生的学术领域,仅仅发表了三五篇相

关论文,就敢走上大学讲台,实在有点冒险。当初之所以有如此勇气,靠的不是“学术功力”,而是“现实需求”——自信这门课对学生有用,也自信经过努力,自己能闯过这一关。感谢北大相对宽松的选课制度,更感谢诸位修课同学的大度与宽容。这门几乎是“现炒现卖”的专题课,居然博得一片掌声。这让我很受鼓舞,十五年间,竟变着法子,开出了如下系列课程:

第一门课:“现代中国学术史”,讲授时间为1991年、1993年、2006年春;

第二门课:“中国文学研究百年”,讲授时间为1996年、2000年春、2002年春及2002年秋(台湾大学);

第三门课:“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讲授时间为2000年秋、2004年秋;

第四门课:“《中国小说史略》研究”,讲授时间为1992年、1995年、1999年秋;

第五门课:“中国大学研究”,讲授时间为1997年秋、2001年秋及2004年春(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上述课程,有的标明学期(春、秋),有的则只有年份,这只是记忆问题,别无深意。在大学教书的都明白,专题课的设计,题目不能太小,范围划大点,翩然起舞时,才能更为从容。实际状况也是如此,讲了这么多轮专题课,从不曾照着题目“面面俱到”过。从一开始就很明确,我的学术史研究,以问题为中心,不学梁启超和钱穆,不写“百年中国学术史”。除了学力不足,更因我之进入这一领域,本来就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当然,其中也包含某种学术理念——对“通史”类著述的普遍怀疑。

拙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出版后,不少书评提及作者之“别有幽怀”。如称这部书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但很大程度是为了解决自身以及一代学人的精神困惑。正是这种压在纸背的“现实关怀”,才使此书采用以问题为纲目的特殊体例——“历史需要今人这样谈论,才会显得

亲切可爱；今人需要有人这样谈论历史，才会觉得寂寞得慰，困惑得解。”<sup>①</sup>也有人由此引申，称此书“蕴含了具体的历史”，可也带有“自我陈述”的意味：“因此，比较梁启超、钱穆的学术史，陈平原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与其说是一部‘客观’的‘中国现代学术史’，不如说是一部‘论辩’的‘中国现代学术史论’。”<sup>②</sup>这是同代人才有的感觉，后世读者，单看字面，不见得会有如此深入、细腻的体味。

说实话，写这书，在我，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自我训练”，更是一种“心灵的探寻”。既与历史对话，也在思考现实人生，平实冷峻的笔墨下面，原本掩藏着深深的困惑与挣扎。将这一写作过程，称之为“思想突围”或“自我拯救”，一点不过分。只是有感于近百年来“以经术文饰其政论”的传统对学术研究造成的伤害，我不希望在史著中发牢骚，放冷箭，于是，将个人的郁积、亢奋与期待，统统搁在同时期撰写的随笔或文化评论中。比如，发表在《读书》上的《学者的人间情怀》《独上高楼》《超越规则》等，还有刊于《二十一世纪》1993年6月号的《近百年中国精英文化的失落》，以及《东方》创刊号（1993年10月）上的《当代中国人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同样是九十年代初在北大讲授“学术史”课程的产品；正因其不太“学术”，更能体现那些“压在纸背的心情”。

与《学术史研究随想》同刊《学人》第一辑的《在政治与学术之间——论胡适的学术取向》，还有发表在《学人》第二辑上的《章太炎与中国私学传统》，这两篇试笔，无论论题还是思路，都带有某种象征意味。关注“学术与政治”、“官学与私学”，明显包含某种现实思考，说“寄托遥深”也不为过。至于借章太炎、胡适之来沟通晚清与五四两代学者，呈现中国学术之转型，因有《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sup>③</sup>在，很容易理解。反而是那些散落各处的单篇文章，容易被忽略。

讲课不同于著述，不必“言必己出”，有时借用前辈成果，再略加发挥；有时解说文献，再组织讨论。著述就不一样了，必须有自家面目，不能瞒天过海。往往是这样的，讲课时效果很好，等到落笔为文，却踌躇

① 李书磊：《陈平原学术观讨论》，《文艺争鸣》2000年3期。

② 旷新年：《学术的凸显——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科学时报》1999年3月2日。

③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再三。写不成大文章，丢了又太可惜，于是转化姿态，变成了“学术随笔”——我谈康有为、刘师培、黄侃、蔡元培、王国维、陈寅恪等文，就是这么来的。在三联版《当年游侠人——现代中国的文人与学者》的自序中，我曾提及：“集中所收各文，多少总有点专业上的发现，与作家所写人物传记不同；但拟想读者依旧是大众。”笔墨虽有变化，讲求的依然是学问的根基。这些不无“一得之见”的小文章——包括那些谈论“学术”的短文，大都得益于我的学术史课程。

学术史课程的开设，对我的阅读、思考与写作，影响很大。只不过有的成绩斐然，有的则雷声大雨点小。比如，跟“中国大学研究”课程相关，我先后出版了《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北大精神及其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中国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大学何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等书；至于涉及“《中国小说史略》研究”的，则只有《论鲁迅的小说类型研究》《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等寥寥数文，还有就是那册还算精美的《（名著图典）中国小说史略》（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信誓旦旦要为此书做一个学术史性质的“笺证”，甚至已跟出版社签了“君子协定”，可就一直腾不出手来。两相比较，你很可能认为，前者远比后者更值得夸耀；其实不见得。因为，开设学术史课程的主要目的，是训练学生，而不是凸显教授的风采。而后者对于中文系的研究生来说，或许更有意义。

我不知道别人的感觉，作为北大教授，每年都要讲新课，压力其实很大。同一门课，隔两三年讲一次，只能部分更新（参看本书收录的两份“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课程安排）；不同课程之间，其讲授的内容，不得不有所交叉（对比本书收录的“中国文学研究百年”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的课程安排）。你可以说教授精力有限，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对于那些在北大呆了十年，听了你好些门课的学生来说，还是感觉有点遗憾。

大学教授开设专题课，方法千差万别。有写了好文章，而兴致勃勃开新课的；也有在讲课的过程中，逐渐酝酿成文的。不管怎么说，专题课的开设，都与教授个人的研究兴趣与学术进展紧密相关。但还有一点，不大为人注意，那就是教授的社会活动，往往也是其相关课程的合理延伸。比如我参与主编《学人》集刊（江苏文艺出版社），以及主持“学

术史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存”(湖北教育出版社)、“二十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丛书(贵州教育出版社)、“现代学者演说现场”丛书(山东文艺出版社),还有已经出版的继承王瑶先生遗志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胎死腹中的希望为九十年代中国学术“存档”的《学术史与规范化》,所有这些学术组织工作,都与我的学术史课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研究生课程不同于个人著述,主要任务是培养人,而不是自我表演。这样一来,学生的切身感受以及实际收益,就变得十分重要。选修我的学术史课程的,绝大部分将来不会专门从事学术史研究;我只希望他们知道什么是理想的学术境界,该如何评鹭学问,有这个眼光,那就行了。按照学校规定,正式修课的学生,必须完成作业;写一篇像样的学术史方面的小论文,得花好多时间,不见得每个人都做得到。这也是我的课上旁听生特别多的原因。以我的经验,讲“学科史”比较容易得到学生的欢迎,因他们/她们有切身感受,而且学了就能用;可我更愿意学生们将眼光放远点,不局限于一时一地之得失。最怕的是太早定型,将学问做成纯粹的技术操作。

本书所收录的,除了我的研究设想、三门课程的“开场白”,还有就是十篇学生作业。为什么选“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而不是别的课程的作业,一个原因是这个题目学生驾取得住(选修我开设的学术史课程的,以中国近、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为主),另一个原因则是丛书的性质决定的——当初说好“尝试论丛”的任务是:“以专题论文集的形式,来实践‘大文学史’书写的设想”。比起精深的专家著述来,学生作业固然显得稚嫩,但稚拙之中,自有勃勃生机在。更何况,本书的主要功用是抛砖引玉——借助一份教案以及若干作业,诱使学界探讨学术史课程到底该如何开。

陈平原

2006年9月27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 课堂讲录

KETANG JIANGLU



## 学术史研究随想



其实,每个成熟的学者,都或多或少地从事一点学术史的研究。进入具体研究课题前的搜集评判已有研究成果并确定自己的突破口,是一种学术史的思考;茶余饭后对古今学界的褒贬臧否,也是一种学术史的品味。这种业余的学术史思考和品味当然很有意思,可无法取代专业的学术史研究正本清源,引导学术健康发展所起的作用。

中国人做学问讲究从目录学入手,因为“学问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类例既分,学术自明”(郑樵《校雠略》)。在注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章学诚《校雠通义》)这方面,目录学和学术史有相通之处。黄宗羲撰《明儒学案》,其序言称“为之分源别派,使其宗旨历然”。可学术史不只是为著作分门别类排列次序,更包括评判高下辨别良莠,叙述师承剖析源流等等,在指示学问途径方面,似乎比目录学更有效。借用梁启超一句大白话:“庶可为向学之士省精力,亦可唤起学问上之兴味也。”(《清代学术概论·第二自序》)从黄宗羲的《明儒学案》、黄氏与全祖望的《宋元学案》,到梁启超、钱穆各自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此

类为数不多的学术史著作，嘉惠后学，功不可没。

学术史的主要功用，还不在于对具体学人或著作的褒贬抑扬，而是通过“分源别流”，让后学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和走向；通过描述学术进程的连续性，鼓励和引导后来者尽快进入某一学术传统，免去许多暗中摸索的工夫。当然，“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没有人单靠学术史学会做学问的。不过，学术史对于建立学术权威，显示学术规范，使得整个学界有所敬畏，有所依循，不至于“肆无忌惮”，还是大有好处的。没必要总结出甲乙丙丁若干“治学准则”，可当你描述和评判某种学术进程时，实际上已经正面或负面地凸现了某种学术规范。

不否认这个时候谈论学术史研究，有对八十年代中国学术“失范”纠偏的意图。单用“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来概括八十年代中国学界，起码是不公允的。我更愿意将学风的“浮躁”与“空疏”归结为旧规范的失落与新规范尚未形成。就好像五四大潮中的学术界，同样也是趋新新奇，泛言空谈，介绍多而研究少，构想大而实绩小。可这种偏颇，不用外力干预，学界完全可以通过自我调整来解决。茅盾将五四初期文学界的“杂乱”，比作“尼罗河的大泛滥”，使得新一代作家“练得一副好身手”（《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序》）。其实学术界也是如此。二十年代下半期到三十年代上半期，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黄金时代；这十年的学术秩序和学术规范，是对五四时期学界“杂乱”的合理反拨。这么说不等于预言九十年代中国学术将有光辉前景，而是指学术史上“传统”与“变革”、“规范”与“失范”交替出现的周期性。如果说八十年代是中国学术史上充满激情和想像的变革时代，“跑野马”或者“学时空疏”都可以谅解；那么，九十年代或许更需要自我约束的学术规范，借助于一系列没多少诗意的程序化操作，努力将前此产生的“思想火花”转化为学术成果。这种日趋专业化的趋势，对许多缺乏必要的学术训练、单凭常识和灵感提问题的学者，将会是个严峻的考验。在这方面，学术史可以提供某种入门的帮助。

之所以强调只是“入门”，因为“规范”虽则对建立学术秩序、发展常规研究有意义；但毕竟是一种束缚（尽管是必要的束缚），故成熟的学者往往部分逾越“规范”。表面上有些大学者做学问无法无天，从心所欲，

其实也自有其内在理路,只不过稍为曲折隐讳罢了。就像中国诗人推崇“无法之法”,中国戏曲讲究“有训练的自由”一样,“法”和“训练”最终都将被超越,可没它入不了门。目前学界的通病,不在于迷信“规范”,缺乏超越的愿望和热情;而在于过分蔑视“规范”,学无根基且自视甚高。因此,提倡一点学术史研究,对于我们这些学问不大而抱负不小的新一代学人来说,或许不无好处。

并非嗓子哑了戏台拆了,唱不了戏,只好改为评戏;治学术史应该是一种自觉自主的选择。在我看来,这既是一项研究计划,更是一种自我训练。在探讨前辈学人的学术足迹及功过得失时,其实也是在选择某种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并确定自己的学术路向。能不能写出像样的学术史著作,这无关紧要;关键是在这一研究过程中,亲手“触摸”到那个被称为“学术传统”的东西。有这种感觉和没这种感觉大不一样。所谓“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不是指了解某一学科某一课题的研究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向,而是指获得一种学术境界。具体的知识和技能可以讲授,而这种境界只能自己去感受去触摸。对真正的学者来说,治学不只是求知或职业,更体现一种人生选择,一种价值追求。陈寅恪为清华大学撰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实际上标示出一种理想的学术境界:“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也就是说,在学术流派的形成、概念术语的衍变、学科的崛起、方法的更新以及名著的产生等之外,还必须考察作为治学主体的学者之人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固然值得大力褒扬;可由于特殊思想背景造成的学者落寞的神色、徘徊的身影以及一代学术的困惑与失落,同样也值得研究。这种研究,不乏思想史意义。

当我批评八十年代“学风空疏”时,并不意味着整个学界“思想过剩”或者只有实证研究才是治学正路,所谓九十年代中国学界将重振乾嘉雄风或重蹈乾嘉覆辙之类的说法,都只是危言耸听。没必要再继续汉宋之争,训诂与义理、博雅与独断、通人与专家、尊德性与道问学,都有其价值,应该由学者依各自性格、才情、兴趣、机遇作出选择。完全没有门户之见即使做不到,起码也不该入主出奴。王国维曾精辟地指出学问之“三无”：“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国学丛刊序》)。



或许还可以添上一“无”：“无汉宋。”当年陆象山讥讽朱子：“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六百年后风水倒流，戴东原反过来称：“然舍夫道问学，则恶可命之尊德性乎？”不同时代不同学派治学侧重点当然有所不同，可不存在世人理解的没有德性的“问学”，或没有问学的“德性”。作为历史课题，汉宋之争当然值得研究；可作为现实选择，没必要在此纠缠不休。黄宗羲《明儒学案·序》中有一段话，对此类门户之见颇有针砭作用：“学术之不同，正以见道体之无尽也。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于一途，剿其成说，以衡量古今，稍有异同，即诋之为离经叛道，时风众势，不免为黄茅白苇之归耳。”治学术史者，当有此通达的眼光；不治学术史者，也不妨在坚持己见的同时，多一点对不同学派不同治学风格的理解，减少无谓的意气之争。

谈论学术史而不是史学史、地理学史或考古学史，似乎过于笼统，有悖专业化原则。除了承接黄宗羲以至梁启超、钱穆的学术思路外，还有如下几点考虑：首先是中国学术传统相对重通人轻专家，即便在二十世纪，好多第一流的学者也都喜欢同时在好几个不同学术领域工作并取得突出成绩，割裂开来不好讲；其次，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研究的专业化程度不高，好多学科正式形成和发展的时间不长，硬要分别为其撰写学史，实在有点勉强；第三，最重要的是，谈学术史而不是某一学科发展史，有利于把握整个学术思潮（如古史辨）的特质及其思想史意义。

英国史学家 G. P. 古奇在其名著《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第一版序言中，自述其写作宗旨：“总结并估计近百年中历史研究与著作的成就，描绘本行业的大师，追溯科学方法的发展，衡量那些导致撰写名著的政治、宗教与种族影响以及分析它们对当时的生活和思想所产生的影响。”除了有必要稍为突出学术思潮外，古奇的这番话，可以移用来描述我们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的设想。

原刊《学人》第一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11月）